

第一章 乘势而起，独揽山西 军政大权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对一般人来说并不适用，但若用在阎锡山的身上则颇有几分道理。阎父曾是一个非常精于算计的商人，不幸因意外而致家道中落。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们偶然发现了军校招考这根“救命稻草”。阎氏父子密谋策划请人代考，顺利过关，从此开始步步高升。辛亥革命风云突变，阎锡山以标统之职被推为山西都督；出身行伍的他却深谙官场之道，大耍手腕，很快就轻而易举地独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一 “骑墙”加“投机”：阎锡山发家的两大秘笈

我祖上世居定襄县，与阎锡山家有远亲关系，辈份上称他为表叔。在他父亲开钱庄时，我曾在他店里当过小伙计，与阎锡山幼年就混得很熟。阎从日本留学回来，当了标统，又经他介绍，我到军队里当哨书。后来又跟他当差遣，左右不离达三四年。至1913年正月，因我通知续桐溪逃避他设计陷害事，被他查出。我为了躲避他的重办，星夜逃出，再未回山西给阎做事。所以对

阎早年的历史，我是知道的。

(一)

阎锡山，字百川，乳名万喜，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其父阎书堂，字子明，乳名长春，由其上辈继承了一份田产，经其积年的刻薄经营，家业渐渐发达起来。但阎子明仍然心不满、意不足，认为仅靠收租放债，没有多大出息，总想找机会投资商业，以便获大利，广事剥削积累。恰巧这年（光绪八年），定襄县有个邢姓大户，原开的一月钱庄，因本钱短少，营业上不甚发达，屡想增资，好角逐商场。定襄县与五台县毗邻，地主豪绅们大多素有往来，邢、阎两家经人介绍撮合，就把这月钱庄合伙经营，因阎子明所投的资金较邢姓原有资金为大，所以他就成了钱庄的大老板，总揽了业务的大权。后因嫌定襄县地面狭小，商贾不如五台县殷实发达，营业资金出路上受到局限，于是把钱庄迁到五台县经营。自此阎子明就在商业上积极活动，加以他略通文墨，洞悉五台各界情况，大施其投机取巧、买空卖空的手腕，在金融头寸中兴风作浪，只有三年，就把这小钱庄经营得十分兴旺，阎子明也就在这小县城崭露头角，俨然自认为绅士了。

1888年（光绪十四年），阎子明的老婆曲氏在生下阎万喜五年后，忽得重病，医药无效，不久即死去。次年正月间，经人做媒，又娶陈氏做继室。这时，阎万喜已经6岁，逐渐顽皮起来，对于后娘的管教不服，因此家庭中不免发生些意见。阎父为了免得家中不和，就把万喜寄养到老丈人曲氏家中。曲家对这个外孙特别疼爱，照顾得非常周到。阎万喜本是独生子，在家玩的伴侣是很少的，到了外祖父家有一些表兄弟一起玩耍，也觉得比在家里好得多，所以后来有时偶然接他回家一趟，他都不大愿意。这

样阎万喜一直到了8岁，经阎父与其岳父说妥，把阎万喜连同其表兄弟一并送入私塾读书。开始他还用功，老师对他还很喜爱，后来一年一年的大了，也就淘气起来，时常惹是生非和别人打架，给外祖父家添了不少麻烦。到阎万喜15岁那年，四书也读完了，曲家才叫阎父把他领回去。阎万喜回到家后，阎父便把他领到店里当小伙计，叫他好好学习生意。阎万喜名义上虽然是小伙计，可实际上是少东家，当然无人敢惹，先生伙计个个逢迎。说起来他学生意倒还用心，算盘打得精熟，也很会应付人，颇得一般人的好评。阎万喜16岁时，经阎父之命，凭媒妁之言，娶了一个徐姓的女子为妻，小两口甚为和美。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关系，各地的商业直接间接都受了不少的损失。阎子明这小钱庄虽在偏僻的五台县，也受了很大的影响，加以京庄兑米款项被阻，出的钱帖子太多等关系，就发生了挤兑。最初阎子明为了维持信用，还拆东补西，设法维持，后来银根越来越紧，山西整个金融界都发生了危机，弄得都没法调度。阎子明卖了一些田地也无济于事，便上起门板，东家伙计一起走掉，这小钱庄就无言地宣告破产了。^①

阎父带着阎万喜背井离乡，到定襄县、崞县躲了些日子，经阳曲县辗转到了太原，因在太原没有什么关系较深的故旧至交，父子俩就住在柴家巷小店之中。本想用带出来的一点钱做个小本营生，先维持眼前生活，再图发展，无奈这时太原也是一片萧条景象，毫无办法，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有一天父子俩正在街上闲逛，看有好多人在围拢着看告示，挤

^①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说：阎的钱庄是1900年由于“打虎”生意失败而破产的。（见该书第二页）

进前去一看，原来是巡抚衙门创设武备学堂招生的广告。阎父看完就拉着阎万喜急急回了小店，父子俩商议起来。阎父鼓励阎万喜去投考这个武备学堂，阎万喜也很愿意；但自思百分之八十考不取，因为洋学堂的课程自己根本没学过，有的连听都没听人说过。父子俩说了半宿，议定只有找人当“枪手”的办法。阎父就想起了当时在山西大学堂读书的赵廉佑。赵是代县人，在阎父做生意时曾与赵家有过往来，也和赵廉佑见过两次面，这次在落难中想起了他，为了儿子的前途，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他。于是第二天买了些点心，父子俩就到山西大学堂拜会赵廉佑。赵廉佑因情面难却，就答应了替万喜当“枪手”，到时顶名下场。阎父子二人千恩万谢辞了出来，痛快心情，自不必表。晚上阎父心想，儿子要考武备学堂，将来是个带兵的官，怎么还能叫万喜呢，况且这又是个乳名，应当起个响亮的大号，想了半天，因胸墨太浅，想不出什么名堂来。阎父这人非常迷信，于是就想到给儿子算算卦，看看能否考上，或叫什么名字好。第二天就跑到一家粗通周易会批八字的算命馆。据说这位算命先生是久考不中的老童生，书读得不错，且能书善画。经这位先生推算了一番万喜的生辰八字，说是五行缺金，并断定这次应考一定得中。阎父就请这位先生结合万喜的命相，斟酌赐一响亮的官名。经再三推敲商酌，就决定了“锡山”二字，从此这个阎万喜，就叫阎锡山了。

到了武备学堂报名的那天，阎锡山办了一切应办的手续，领了入场证，多日来不安的心情，安定了一半，然后又把入场证，送到山西大学堂，交给了赵廉佑，并又重新拜托了一番。

当武备学堂初办之时，各省都是一样，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本没有交验相片的规矩，况且赵廉佑的年龄只比阎锡山大两岁。到了考试那天，赵廉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一早就进场应考。赵廉佑在山西大学堂，原也算是一个好学生，功

课不错，把考试题目一看，觉得很平常，就满意地完成了考卷。等到发榜那天，阎父子俩前去看榜，阎锡山三字竟名列前茅，被录取了。父子俩当时的喜悦心情，自不必说。所以后来赵廉佑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时期，总有个官做，也捞到了一些油水。阎父在阎锡山进入武备学堂以后不久，五台钱庄的债主逼债挤兑情况也冷了下去，便对儿子叮嘱了一番，就回五台收拾那份破家业去了。

阎锡山进入武备学堂以后，确也努力用功，对一些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很是用心。对于教官、督练官总是毕恭毕敬，表现得非常驯顺，日子久了，渐渐博得老师们的欢心。在同学中也拉拢了一些学科、术科好的同学作为知己，后来竟当了一名学生班长，很得学堂和老师们的信任。

1904年，清廷遴选各省武备学堂优秀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阎锡山因得到学堂老师们的信任，也被选中；同时入选的还有马开崧、温寿泉、王宝善、黄国梁、张维清等。

这年7月，北方各省奉清廷之命，入选学生先到北京集中，会齐同赴日本。到北京住了不到一月，听了兵部侍郎姚锡光的讲话后，又玩了几天就乘船到日本去了。

阎锡山到了日本，先入振武学校，以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他学习兢兢业业，努力用功，除了对日本的教官极尽恭维之能事外，就是对日本的学生也是卑词谄谀。

当时（即1905年）正是爱国人士对清朝腐朽无能深恶痛绝的时候，孙中山、黄兴（克强）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在日本非常活跃。阎锡山看到这种潮流情势，也活跃起来，在进步人士面前尽量表示对清朝不满，不久他参加了同盟会。此后，他更加表现出“革命”干劲，经常奔走围绕于同盟会人士之间。不久又进入了黄兴、陈之骥、李书城等组织的“丈夫团”。

当时山西留日学生中尚有学习其他科目的赵戴文、南佩兰（杜馨）等数人。赵戴文文学基础较好，亦系五台县人，原与阎家有世交关系，阎锡山为了拉拢一些功课较优的学生，对自己有帮助，就与赵戴文、黄国梁拜了把兄弟。并对活跃的日本学生广事结交，如土肥原贤二、樱井隆治、坂垣征四郎等都与他时有往来。1913年（民国二年）正月，樱井曾秘密到太原访过阎。

1909年（宣统元年），留日士官生第六期结业，阎锡山等学成归国，由横滨经上海回到北京，在陆军部报到后，经过考试传见后，在北京玩了足有两个月，直到中秋节才回到太原。这时山西巡抚是丁宝铨，新建军的督练总办兼协统是姚鸿法（姚鸿法是北京陆军侍郎姚锡光的儿子）。当时清政府规定留学生回国后，一般都先当教练，看看成绩如何，再行补充当队官等职。因阎锡山善于钻营拍马，嘴甜如蜜，把姚鸿法哄得晕头转向，阎虽名为教练，但不常到队里去，总是呆在督练公所围着姚鸿法转，替姚出谋划策如同参军一样。姚鸿法当然也乐得有个帮助他办理琐事的，日子一久，阎锡山在督练公所里就与其他留日归国的学生不同了。

（二）

山西混成协中有一标统齐允（旗人），素来吸食鸦片，为人懦弱无能，与姚鸿法处得不协调，姚总想换掉他，因见黄国梁年轻能干，就免了齐允，将黄升了标统，温寿泉、马开崧也都陆续当了管带。阎锡山为了广事拉拢培植私人势力，经过姚鸿法的允许，还兼了陆军小学的日本教官。后来为他奔走效命的张培梅、周玳、朱蒙滋等当时都是学生，他们与阎的关系，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阎锡山凭着两面手法，百事百通，颇为得意，但有时想：仅联络了一些军官，总不能算掌握了军队。这时山西新军混

成协内只有两标，一标已被黄国梁掌握，另一标标统是夏学津，夏既有靠山人也干练，很难下手取代，可是要想抢夺新军的领导权，还必须把夏学津挤走，取而代之不可。

事有凑巧，1909年（宣统元年），清廷下了全国禁绝鸦片烟的命令，要在六年内各省完全禁绝。次年（宣统二年），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竟蒙奏清廷说：“山西全省已完全禁种，吸食者不久也可绝迹。”事实上山西文水、交城一带，不但没有禁绝，反而较原种面积更为扩大，烟苗也特别茂盛。清廷收到丁宝铨的奏折后，就在4月间派钦差前来查勘，这一下可急坏了丁宝铨，如被查出，岂不要负欺君大罪。于是派夏学津带兵昼夜去文水、交城一带，勒令县知事立即将所种烟苗铲除。种烟农民向以此为生，他们为了生活，怎肯奉命？于是男女老幼成群结队地哀求收回成命，县长和夏学津不敢应允，而农民因老幼生活所关，势非达到保护已种烟苗不可。这时夏学津为了完成任务，就令兵士亲自动手拔除烟苗，弄得遍地男哭女嚎，拉着士兵不让动手。夏学津一看怒了，就命令兵士开枪恐吓。这一开枪，就激起了众愤，有的人就喊叫宁可被打死也不能饿死。人越聚越多，越说越僵，结果烟农死伤数十人，烟苗被铲除得干干净净。丁宝铨为了掩蔽这一场屠杀农民的滔天罪行，竟诬烟农为匪，上奏清廷。山西各界见此情形，纷纷联名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抚恤死者。

阎锡山睹此情形，认为这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于是就大肆活动。他一方面利用民愤，对巡抚丁宝铨表示反对；一方面派张树帜、李嵩山等到处煽风点火，并秘密派人到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把当时情况绘声绘影地写成稿件，交由《晋阳公报》发表，并写些黑名帖到处张贴，弄得太原满城风雨。这一折腾，北京的《国风报》、上海的《申报》也转载了这一消息，可以说是全国上

下，舆论哗然。阎锡山、赵丕廉等又鼓动素有“猛张飞”之称的张树帜到北京告了一状，事情就越发热闹了。经过御史胡思敬奏参，清廷把丁宝铨撤职留任，标统夏学津则撤职查办。于是这个标统头衔就稳稳地落在阎锡山头上。

这时正闹预备立宪问题，各省都成立了咨议局，山西省咨议局长是梁善济。阎锡山既已抓到一部分军权，就又在政治上打了主意。他为了接近这个所谓代表民意的咨议局长，费了不少精神和钱财：始与梁的秘书邢善长拉上关系，继而结为金兰之交，得邢的誉扬，逐步得到梁善济的青睐，取得立宪派的信任；同时他利用同学、同乡、拜盟兄弟等手法，居然把自己变为混成协内同盟会的秘密领导核心了。但是有两个管带对阎的为人素来鄙视，绝对不买他的账，曾使他伤了不少脑筋。这两个人一个是姚以价，一个是熊国斌；后来熊因刺阎未成，反而被阎杀死，而姚以价则坎坷终身，并曾几度被阎赶出山西。

(三)

1911年（宣统三年），各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廷轴心已烂，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虽然立宪派在各省吹吹打打，想用民族调和的办法暂维清朝的统治大局，但也未能邀准爱新觉罗们的应允。10月10日同盟会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举起了义旗。东南各地纷纷响应。消息传到这素称黄土高原的西北，有志之士也都跃跃欲试，至10月22日，陕西张凤翔等宣布了起义。山、陕地势相连，这一消息在山西更为振人心弦。革命党人景定成、李鸣凤、续桐溪等都在计划相互策应。当时清廷在山西的军队，只有姚鸿法这一协装备较好，其余如巡防营、警察队等，都是吃局弄赌专门吓唬老百姓的“瘪货”，没有多少战斗力。

这时山西巡抚已由原任江苏布政使的陆钟琦接替，他听到陕

西革命的消息后，即与三司和姚鸿法等相计议，并由平阳总兵调马步兵集中待命。他们认为黄国梁所带的一标靠不住，便决定以防止陕西革命军东渡为名，调黄部离省城以防意外。这时阎锡山的一标则被认为是可靠的，因此对他疏于防范。由此也可看出，阎对清廷派在山西的上层统治人物，是如何工于心计了。

黄国梁接到开拔调防的命令后，本想就地举事，马上在太原动手，但无奈军队只有枪没有子弹（这是清廷防止新军叛乱的一种办法，各新军平时只有枪支不发子弹）。黄、阎和温寿泉、乔煦等商量的结果，认为只有遵照命令答应出发才能领到子弹，等领到子弹后再返回头来攻打太原城。商议既定，次日黄国梁即带着部分部队先行出发，把领械弹给养的部队则派为后续部队。当后续部队把应领的给养械弹领到手后，运到太原城南没有几里地就放下了，并派人骑马追赶通知黄国梁迅速回马攻打太原。这一行动本来是事先商议好的，队官们也早就心中有数了。各管带队官见黄国梁尚未赶到，又想事不宜迟，就公推张树帜为指挥官^①。很快黄国梁的后续部队就回马攻城，打响了山西起义的第一枪。这天是10月29日，新南门很顺利地攻开了。接着分兵两路，一路打新满城，一路攻向巡抚衙门。守城的统领谭振德等闻知兵变，尚拟镇压，但刚一出门即死于乱枪之下。巡抚陆钟琦和他的儿子陆光熙亦被起义军枪杀。说起来，陆光熙倒是有些冤枉，他是留日的士官学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有一定的联系，也是同情革命的，据说此次到山西是为了劝他父亲反清复汉，不料事起突然，也遭杀身之祸。

阎锡山听到黄国梁的队伍已围攻巡抚衙门，才下令他所带的

^① 以后在姚以价表示赞成起义后，张树帜以姚为二营管带，地位较高，和苗文华、应芝等商议，公推姚为司令官。（参见《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第十八页）

八十六标队官张培梅进攻防守太原的巡防营马队，他自己则带领几名亲信藏在树林子内观战。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起义成功，则是大功一件，倘若失败就可把造反的责任推到黄国梁、张树帜、张培梅的身上去。

在起义军初攻巡抚衙门之时，守护太原城的清军还想拼命抵抗，后见统领巡抚相继被杀，也就各自四散逃命去了。等到重要地点白旗高挂，起义肯定是胜利了，阎锡山才带着人马煞有介事地杀奔巡抚衙门而来。阎锡山到了巡抚衙门，虽然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一切还很纷乱，他无心顾及其他，主要考虑是如何拉着盟兄弟们，抓取胜利果实。经过大家计议，一致认为应该推举一个素有威望的人来撑持这个局面，以安人心。你一言我一语地议来议去，都想推姚鸿法为都督，因为姚是汉人，又是新军的协统，一些军官们对他尚有好感。阎锡山见此情形，也只有附和众议。但把姚找出来后，姚因顾虑他父亲仍在北京任职，如果自己出任了山西都督，岂不把父母送到菜市口刑场去！就婉言谢绝了大家的要求，并建议另选贤能。这时有人嚷道，我们起义刚刚告成，一切善后待理，我看还是大家都集中到咨议局去商量商量，再作选都督的决定为好。大家一听，言之有理，就都说对对、好好，我们都到咨议局去。惟有阎锡山这时沉着个脸，表现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起义军官兵们一窝蜂地跑到咨议局，会议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梁善济就对咨议局庶务常樾说，叫大家坐好静一下，开会罢。但开会之前没有人宣布开会宗旨，不知道是谁在墙角喊了声，请率领起义的统领管带大人们先讲讲响应武昌革命的经过，接着就都说“好好！对对！”于是坐在前边的温寿泉、姚以价、乔煦、赵戴文等就相继把起义成功的经过吹嘘了一番。接着请梁善济讲话。因为梁讲话文绉绉的，除了光复祖宗基业、大夏神州

宾服四海之外，一些话都让人听不大懂。梁讲完话，阎锡山也东拉西扯讲了些反满复汉、庆祝成功的话。以后，大家对选都督的事嚷起来了。梁善济主张用票选，他拿着一叠红纸，拟作选票。正在梁善济讲解选举如何是大事，如何是民为邦本的时候，张树帜一个箭步跑到台前，把手枪往桌上一拍，并把梁善济挤到一旁，大声地叫嚷说：“选都督做么子要票选，我们军人不干这一套，要选就举手好了。他也不等众人表示意见，接着就大声地喊叫：“选阎标统做大都督，赞成的举手！”这时张培梅等就丁零当啷地把会议室大门一关，随即亮出了手枪，并大喊着说：“选阎锡山做大都督，请大家一齐举手！”这时阎锡山的盟兄弟们也一齐喊叫起来：“选阎锡山，选阎锡山做都督！”一些军官当然纷纷举手。至于那些议员绅士老爷们，除了吓得哆嗦打牙说不出话来以外，也只好举起手来说：“选阎标统好，选阎标统好了。”

正在为选举乱嚷怪叫的时候，梁善济就从后门溜走了。

在手枪威逼之下，张树帜连喊两声全体赞成，张培梅也接着喊了几声，阎锡山当选大都督就算全体通过了。阎锡山这时又站起来，假装客气了一番。随后又选出起义作战最力的温寿泉为副都督。这一场真武装假民意戏剧式的选举才算告成。

(四)

11

都督当上了，善后怎么办，人事如何安排，军政饷糈处处需款，阎锡山在赵戴文的启示下，决定成立“大汉银行”，印发山西通用票；但对这银行总理人选，大费踌躇，想来想去是非用自己人不可，于是阎的老丈人徐一敬就当上了“大汉银行”的总理。至于军队方面人事安插，倒不成什么大问题，只是他顾及姚以价这人不好办，非给个大大的名义不能羁縻他、使用他。但又怕姚在太原捣乱，于是他决定给姚一个东路军司令，并把赵戴文任为

都督府参谋长，让他随姚东征，率军进驻娘子关。与其说是叫姚东征，不如说是叫姚给他看门；但他又怕姚不可靠，变成吴三桂，所以特叫赵戴文监视他。赵本不是军人，但当时在一般人眼中，他是有才善说而又计谋多端的有为青年，而阎要重用他，主要是因为他对阎臣服不二、忠心耿耿。

姚以价和赵戴文走后，阎紧接着又发表刘汉卿为南路司令，张瑜为北路司令，并令张配合地方武装取道雁门向北进军，光复大同。同时把原有的军队改编为四个标（相当于团），以张煌为第一标标统，苗文华为第二标标统，第三标标统由刘汉卿兼任，第四标标统由张瑜兼任。经过几天的紧急筹划，在太原的军队整编大致初步完成。阎对驻在山西各地的清室官吏和防营，采取了劝降的办法。这些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

一天，吃晚饭后，外边通报说原八十五标三营管带熊国斌求见，阎锡山一愣之后说：“他们又出了什么事？请他进来吧。”熊国斌进来后，一言未发，掏出手枪就向阎锡山射击，阎一惊就溜到椅子下去了。也正因为溜到椅子下，枪弹才由头上飞过未能击中。熊拟再开第二枪时，阎锡山已抄起铜痰盂打了过去，正在这时阎锡山的卫兵向熊连开了三枪，一枪打在熊的腰部，一枪打在熊的屁股上，另一枪则打在墙上挂的山水屏上。行刺未成，熊国斌当场被擒。原来熊是不赞成革命的，一向主张效忠清室，他见阎锡山当了都督，对他又不提拔，心中更加怀恨，所以想杀死这个起义都督，以建奇功。讪料反被阎锡山生擒，扔进石灰池里活活烧死了。这消息传出后，熊的士兵就在太原城里烧杀抢劫起来。阎锡山听了吓得不敢出屋。幸赖副都督温寿泉，亲自带着队伍将乱兵镇压下去。经过一天一夜之后，市面才安定下来。

(五)

山西响应革命起义，巡抚陆钟琦父子被杀，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旋即发表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命其带兵入晋平乱。但吴禄贞也是革命分子，早就计划推倒清廷，只是尚无行动表露。他得此机会，就将队伍集中在石家庄一带，并派人与晋军东路司令姚以价联络，想配合行动，共图大举，率军进攻北京。姚以价事体重大，未便轻允吴请，就电告阎锡山请他到石家庄共同商议。阎锡山因被熊国斌的一枪吓破了胆，踌躇再三不敢前往，虽经温寿泉等相劝，总是犹疑不定。最后他听见说晋南民党的李鸣凤、景定成等都应吴禄贞之约，已进兵娘子关一带，觉得自己若再不出头，必然被晋军一些将领耻笑，他这才打电报给赵戴文，问赵他到石家庄来是否安全，在赵答复他“可以来，没问题”之后，他才安排东上，嘴里还不断地吩咐卫队们说：“挑好的家伙带着，多带上些子弹，这是冒险的事啊！处处要谨慎小心啊！”阎锡山既已决定东上晤吴，大家都很高兴，想不日将有惊人的奇迹出现。正在准备动身的时候，阎锡山忽然又变卦了，他说：“石家庄我不能去，那是吴禄贞的防地，万一有变，那可怎好。”经人又与赵戴文、姚以价联络了半天，才把吴、阎会晤的地点改为娘子关。后来听说在赵戴文与吴禄贞改订地点的时候，吴禄贞曾说：“昔日关云长敢单刀赴会，何以今天的阎百川不敢来见盟友，岂地灵人杰耶？时移势易耶？”说完哈哈大笑，并说我到娘子关去见他好了。11月某日，阎锡山带着黄国梁、马开崧、张树帜等，并由大批警卫人员护从到了娘子关车站；而吴禄贞则轻随简从、只带着参谋孔庚等三人。在会上吴禄贞滔滔不绝地述说他的革命计划，主张组织燕晋联军，进军北京，并肯定地说，现在清军大批南下，北京空虚，只要我们队伍一抵北京城下，革命大业

就算定了。阎锡山等认为吴的分析很有道理，意见趋于一致，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副司令，山西先拨两营兵给吴禄贞指挥，随后再出一旅为后继军。詎料因吴禄贞扣留南运械弹，惹怒了袁世凯，袁派人秘密刺杀了吴禄贞。吴禄贞被刺消息传出后，山西派出的队伍只好又由统领管带带着退回山西。而吴的部下孔庚等数人也随着退到山西，其他人大多四散了。这燕晋联军，只是昙花一现。

吴禄贞死后，清廷随即发表张锡銓为山西巡抚，接着命令曹锟的第二镇第五协由卢永祥指挥，经井陉乏驴岭向娘子关进攻。姚以价指挥晋军抵抗了三天，虽士兵奋战，终以众寡悬殊，后方援军不继，在雪花山受到清军正侧夹击以后，损失严重，败退下来。姚以价在撤退时，几乎被清军迂回前进的部队活捉，幸赖他地理熟悉，爬荒山，穿小径，才退向晋南，得以逃脱。赵戴文系文人出身，在开战时他总是在队伍的后面，所以在退却时他跑在前头，未遇什么惊险，后来他还收拢了一些败退下来的队伍。阎锡山说他临大事而不惧，给他记了一功。

(六)

东路不支，娘子关失守，清军入晋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都督府里转来转去，接连开了两次会议，也没议出个万全之策来。这时阎锡山主张放弃太原，赵戴文、张树帜等也附和阎的意见；但副都督温寿泉不同意，他主张阎锡山坐镇太原，以免动摇军心，影响革命大业，温并主张，主动出击，阻击清军于太原外围。由于阎锡山坚决不肯留太原，怕当清军俘虏，结果，只好决定由温寿泉镇守太原，全权指挥前方抗清事宜。此后阎锡山与赵戴文等，就跑到包头避难去了。

在阎锡山等向包头方面逃跑的时候，正是北路军攻打雁门关不下，孔庚、张瑜等带队退到怀仁县整顿的时候。他们听到娘子关失守，阎锡山已出走包头，于是孔庚、张培梅等也就带着队伍向包头方向靠拢，希望与阎锡山会合。这时协统张瑜因雁门关作战不利，跟张培梅等又发生了一时不能调和的摩擦，加以他对于革命丧失了信心，就离开队伍走了。后来这个协的协统就由张培梅暂代，不久阎锡山便派他正式升任了协统。

一天阎锡山带着残兵败将行至保德，忽见孔庚、张培梅带着从雁门、怀仁退下来的军队来找他，心里特别高兴。但这时军队大多还没穿上棉衣，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大家计议了一番，认为首先必须派人先筹划一些给养，河曲县素称富足，以先向河曲筹款为宜，便派张树帜带上一些军队即时前往。

张树帜到了河曲，见到该县知事，说明奉都督命为筹办军需，要借银二万两，詎料这位县太爷不买账，并与地方绅士大户串通一气用罢市来抗拒，惹得张树帜火了。一天张来到县衙，指挥士兵把县知事为首的绅士大打了一顿，市面就马上开了市，二万两银子马上也借到了手。

阎锡山带着人马刚到古城，忽报包头革命党人杨瑞鹏、王肯堂前来求见。原来杨瑞鹏等原拟在包头起义，响应革命，并已说服清军管带谢有梓参加起义。惟有五原同知樊恩庆表面上赞成起义，暗地里却另有打算，他在宴请革命人士的联欢会上，把所有出席的革命人士和同情革命的军官全都逮捕杀害了，杨瑞鹏、王肯堂因事外出，未遭此难。杨等听说阎锡山等到了古城，所以特地来投，并要求进攻包头，为死难同志报仇。第二天在大同方面起义失败的李德懋因在丰镇起义失败，也率领一部分骑兵来投。阎锡山一看人马步兵已有 3000 出头，胆子也就大了，于是和大家商议了一番，就分兵三路直扑包头。包头守军樊恩庆见起义军

突然进攻，莫明军队从何而来，只好仓皇应战。因他的军队不足起义军的半数，只半天多的时间就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未死的少数官兵也就四散逃跑了。革命军随即冲进城内街市，阎锡山也随军进了包头。

(七)

袁世凯于1911年11月被清室起用，到了北京，他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大耍其两面手法。次年3月南北和议之后，山西巡抚张锡奎也调往他处。清军卢永祥部为了追逐温寿泉、李鸣凤的革命队伍，由太原转向晋南，经平遥、介休、灵石而后进入赵城。因抢掠已足，不久转回了直隶。清廷大军既已离开太原，肖小甚为活跃，外县乱糟糟的情况不用说了，就是省城太原偷盗抢劫之事，也时有发生，闹得家家不安，鸡犬不宁。这时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派代表来到包头，要阎锡山还省主持大计。阎锡山认为虽然南北已在和议，但今后局势尚难预料，包头比较稳当，他不愿也不敢回省冒险。直到咨议局二次派人来催请，他才答应回省，但仍然是心悸不安地缓缓而行。2月19日，行到忻州县境时，忽然接到袁世凯一封电报，内容词句记不清了，大意是不准他擅自行动。这一个意外，使阎锡山着了慌，他只好在忻州住下，但又不能把这一消息传出去。阎的盟兄弟虽然都用尽脑子想办法，但什么办法也想不出，弄得大家都懒吃懒睡，昼夜愁眉苦脸。幸赖黄国梁把军队安排得有条不紊，撑持着这个都督行署的门面。一天晚间，阎锡山忽然想起一个主意，请南桂馨到上海，见见中山先生，报告一番他在山西起义的功劳，请中山先生大力支持他们回太原。同时，阎派人发电报给他在南京、上海和武昌的同志，要求他们给以支持。阎锡山这样做过以后，还怕不牢靠，又想起了一个两三代以来都在北京皇宫包揽工程的定襄县人

董崇仁。董氏家大业大，在北京与一些太监头儿王爷长史多有深交，袁世凯做直隶总督的时候，与董也有拉拢，这是阎早就知道的。于是他卑词厚礼派我到定襄去请董崇仁到忻州会面。董崇仁到了忻州，阎锡山厚礼款待自不必说，两人越谈越近乎，在阎把请他代向袁世凯处疏通的话说出后，董慨然允诺，并答应马上去北京。董到了北京见到袁世凯，确实替阎锡山说了不少好话，对于让阎锡山仍然担任山西都督的事，起了转圜的作用。这时南桂馨也到了上海，把山西起义的事自然是大肆吹嘘了一番。旋经中山、克强两先生与袁世凯一再电报商榷争论，才把山西列为起义省份，正式委任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忻州接到任他为都督的命令后，如获圣旨一样，多日悬在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他高兴地说：“这也是我阎家祖上有德，山西百姓不该遭难；今后我一定把山西治理得好好的，让袁世凯他们看看我的本事。”于是派骑兵一排送命令给太原各机关，并传令第二天人马一齐向太原进发，沿途威武炫赫，在乡里面前很夸耀了一番。这与狼狈逃出太原的时候，悄声急走的情景大不相同了。



1912年9月，阎锡山同到太原视察的孙中山合影

(八)

阎锡山回到太原以后，到了都督府，曾经热闹了一番，然后安排人事，开始办事。他筹思再三，决定了三件事情，同时并举：第一统一军队，第二筹办财政，第三委任县长。第一步使他感到困难的，就是山西第一旅长的更动。因在他逃往包头的时候，第一旅旅长已由副都督温寿泉委任了李鸣凤。李系安邑人，秀才出身，同盟会会员，有胆略，善口辩，人缘甚好，唯平日对阎锡山所作所为表示不满，在太原与崞县续桐溪被人称为南北二杰。阎锡山想更动他，但又无词可措，只好暂时忍耐下来；为了削弱温、李的力量，他借山西饱经兵乱，饷糈缺乏，一切善后待理为名，派南桂馨为河东筹饷局局长，并请准袁世凯加以委任。南桂馨当了局长后，就受阎的指使，驻在运城，其目的是一来察看李等的动静，二来是相机收买李旅的团、营长倒李。后来南收买李部的事被人发觉，报告了李鸣凤。李本来早已看出阎派南来河东的意图，这下有了人证物证，就把南扣押起来。阎得此消息，就故意扩大事态借题大作文章，电袁报告“李鸣凤扣押省员，劫饷购械，图谋叛乱”。袁世凯早已知道李鸣凤是同盟会员，李在与卢永祥作战时，又有“硬老西”之称，袁为了削弱、打击山西革命力量，就借这个机会派驻在河南的毅军统领赵倜率军由茅津渡过河剿办李鸣凤。李出于不备，当他听说赵倜来山西的时候，还同河东道尹张士秀一同前往茅津渡迎接，在茅津渡经赵倜询明扣押南桂馨的原委后，就把李鸣凤、张士秀送往北京交给了袁世凯。袁就命陆建章把李、张押起来，直至后来陆建章率军进陕才把他俩放出，命李随陆参赞军务。但因阎锡山认为李鸣凤是他政治上的第一号敌人，总是放心不下，在李被押在京的时候，他把李的安邑老家抄了，并把李的一个胞弟予以逮捕秘密枪毙。

后来他又串通陈树藩的部下，在西安郊外把李鸣凤狙击而死。

阎锡山对晋南的革命人士是这样，对晋北的革命领袖也是使用拉、打、杀的办法对付。辛亥时期晋北忻、代、宁一带的公团，在续桐溪领导之下，对革命确实尽了不少的力量，尤其是安抚晋北光复大同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民国元年续桐溪当了山西警察道，日常事务多委其秘书赵丕廉办理，自己则经常与阎锡山等纵谈国事，建议充实力量，以备万一，一旦国事更张，不至束手无策。对阎锡山的投靠袁世凯曾屡次表示不满，有时甚至对阎锡山的八面玲珑，当面给以讽刺或揭穿。日子一久，阎锡山就想把这个巡警道拿掉，收拾了这个肘腋之下的异己者。事有凑巧，一次军警因细故闹起冲突，阎借机派人煽惑把事态扩大，并暗地里在背后指示军官和绅商请愿，要求撤换续桐溪，军官绅士们还声言将到北京去告状。而续桐溪也不肯示弱，找到阎锡山大闹了一场，并把他阴谋诡计营私舞弊的事当面予以揭穿，弄得阎锡山恼羞成怒，晚间就想派人把续逮捕，借军警冲突为名把续干掉。我不忍看续被暗害，就偷着给续送了一个信，让他逃走了。不知后来怎么让阎知道了，就声言都督署里有续的人，一定要彻查，查出来非重办枪毙不可。

阎锡山在对军事上、政治上的异己者如此打击的同时，在经济上，则以“大汉银行”广印钱票，收买大批铸造铜元，作为掠夺积聚财富的办法，并以统一税收为名成立省税局，委岳叔父徐一清兼任局长，重捐累税大事横征。还选派心腹人等到交城、文水和偏僻小县去当县长，督促当地农民种植鸦片，而后由他收购外运，从中大量牟取利润，以维持和扩充他的嫡系部队。他为了笼络人心，允许部下奴性十足的军政官员贪污发财，盖房置地；换句话说，也就是用财产和名位，把为他卖命的人拴在山西，好为他效命驱使。他也正是使用这些方法，使一些人逐渐向他靠

拢，甚至有的人给他作了一生的反动工具。

他对袁世凯的卑躬屈节厚颜逢迎，那则是为一般北洋派人所办不到的，如他一年三节两寿都是挖空心思竭力奉献，仅上好汾酒 200 坛 500 坛地不知送了多少次。尤其可耻的是他把他父亲和继母安居到北京，名义上是说让他父母开开眼界，见见大世面，实际上是为了打消袁世凯对他的疑忌，送父入质。他对袁世凯“畏之如虎，敬若神明”。所以在袁世凯派金永为山西巡按使后，金在山西不断找他的茬子，并在政治上打击他。他都以“忍为高”极力应付。他的这个小团体，没让金永拉垮打垮，主要就是靠他的上述手法来维持住的。

(张瑞生)

二 牛刀小试,为争省长力挫梁善济

(一)

1918 年段祺瑞是内阁总理。梁善济是山西的国会议员。梁善济的儿子梁上栋，是英国留学生和英国人有所勾结，他当时任陆军部的秘书，住北京。

英国的福公司，在清朝末年曾经取得了山西煤、铁和煤油的开采权，后来没有开采就被山西收回，英国人不死心，又进一步计划夺取山西大同煤矿的开采权。因此，福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福乐善，就勾结梁上栋设法再向山西当局提议合办有关煤矿的开采事业。梁上栋向他的父亲请求办法，梁善济即函阎锡山，介绍福乐善到晋协商。

福乐善到了山西后即投函谒阎，当时阎兼省长不久，没有专门交涉外事的人员，就把这一事件交给了警务处长南桂馨办理。南记取了以前对福公司的教训，所以此次向福乐善提出的条件较

严，几经磋商，大意是这样：

甲、矿区的规定：以大同附近的永信庄和煤峪口为限。

乙、股份的规定：中英各半，但中国方面以矿区作为 40%，只投现金 10%；英国方面 50%，全为现金。

丙、人事的规定：董事中英各半，但董事长由中国人充任；经理必须用中国人，以下多用中国人特别是山西人。

这只是一种口头约定，投资总额和一切细则，均未详商。福乐善承认先向英国招股，待股东招有成数再议，但他临行时认为中国权利过大，恐怕不易招股。实际上这是最低条件，他站在侵略的立场上，所以感觉到英国的权利不足。不过，此事原由英人提出，山西当局恐怕有麻烦，也不希望它有什么结果。

日本垂涎山西煤矿已久，乘此也插进来了。著名的资本家住友氏和梁士诒勾结，以大同煤矿为对象，向山西当局交涉，决议开设同宝公司。私下已有协议，但未公开。当时总公司设在北京，大同设了分公司，住友银行先拨了 150 万元，梁士诒加入若干，外间无从知道。当时规定的矿区，为大同的煤峪口和怀仁县的马林涧。但马林涧是辛亥以前怀仁县的知县汪大焕用机器开采过的，汪死以后，由他的幕僚程澹接办。后来又卖给了张树帜和徐子澄，但是只能维持现状，并未大量出煤。至于煤峪口矿区，根本没有开采。当时同宝公司和张树帜及阎锡山的代表人阎子安商定：由该公司拨付马林涧矿区 30 万元垫款，扩大开采；拨付煤峪口矿区 30 万元，即行筹备开采。两区开采权即归同宝公司所有。这事也在 1918 年，但在和福乐善的口头约定几个月之后。除同宝公司拨出 60 万元款以外，也没有其他细则的规定。

以上这两件事，如果就“利权不外溢”来说，任何山西人都可以反对的，梁善济因他勾结英人开采大同煤矿失败，心怀不满，于是联络了部分学生发起反阎运动，目的是为要夺取阎所兼

的省长地位。

(二)

梁何以有此想法呢？这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实原因：

甲、历史方面：辛亥革命以前，梁善济任山西咨议局议长，因在从福公司收回山西矿区的运动中和丁宝铨有所勾结，得到丁的信任。阎锡山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直至“荣任”标统，时时得到梁和徐子澄的提拔。辛亥革命时，阎梁互相利用，互相掩护，无论从地位或私交方面来说，都是分庭抗礼的，和别人作为阎的属员有所不同。梁自认为有当省长的资格。

乙、当时条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是段祺瑞，汤化龙掌内务，梁启超掌财政，林长民掌司法。在辛亥革命以前，梁启超是立宪派在海外的首领，汤、林和梁善济也都主张立宪，并且都是咨议局派；辛亥革命后，他们三人同任第一届众议院的议员；后来，梁、汤、林等成立了研究系，同为领导人，梁善济也是主要人物。梁如果作山西省长，对研究系是绝对有利的，他们三阁员，自然会替他作到应有的努力，也就是向段怂恿这一事的成功。此其一。段当时最信任徐树铮，徐对他可以说私话，较以上三阁员更进一步。而且梁子上栋任陆军部的秘书，深得徐的垂青，他可以向徐说私话，由徐转段。这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此其二。

梁善济既然有了以上的资格与条件，又抓住这个大题目，所以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他说阎锡山勾结英日，出卖矿产，就等于饮鸩止渴，引狼入室等等。无非是想引起山西内外的人们反对阎锡山，使他不能再干下去，至少要把省长让出来。但是阎锡山绝不示弱，首先把梁善济介绍福乐善的原信，在各报纸上予以公布，那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了梁善济致

命的打击。但梁已经骑在虎上，不能下来，仍然继续他的行动。张树帜得了同宝公司的 30 万元，也在被梁攻击之内，张收买了大同的若干学生（张是大同镇守使），到了北京，向梁善济直接压迫。那时，梁住西河沿的代郡会馆，这些学生就到他家里强行居住，甚至门外都住了若干学生。他们对梁说：“你是议员！吃喝享受都很好。你要知道，大同府地瘠民贫，所靠的只有煤产，但是很多年来，仅用土法开采，不但产量很少，死人也多。如果用机器开采，可以增加产量，减少死亡。纵然利用外国资本，到时还能收回。你既反对，难道你有力量吗？现在我们都是大同一带的人，前来和你请命，要问你的办法；在没有办法以前，我们就住在你家里，你吃我们就吃，你不吃我们也要吃！”这种突如其来的遭遇，使梁无法应付，也不敢使用军警；因这是老乡学生对议员的请求，军警也不便干预。这就把梁难住了，他的饮食起居，几乎失了自由，更不用说行动了。他已年老，他的儿子们担心他的健康，所以，他的第三子上椿出来，和学生们疏通，担保他停止活动，再不反对这两件事。学生们任务完了，也就回了大同。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就是梁的长子戊子，在崞县原籍吸食鸦片。阎锡山在张树帜派遣学生到京之前，就把戊子以吸食鸦片为名逮捕看押，后经汤化龙电阎，始行释出。

这一场争夺省长的战争，梁善济失败了。从此，再没有人敢与阎锡山抗争，于是阎的政权更加巩固了。至于福公司代理人福乐善因见大同煤矿已被日人夺去，也再没有回信；最后同宝公司也没有结果。阎张各得 30 万元垫款，并没有履行原议。

上文关于和英人福乐善以及和同宝公司交涉的资料，是南桂馨先生供给的。

（李泰莱）

三 借力使力,巧妙献媚袁大总统

陈钰在辛亥年间，不过是直隶省宣化府万全县的一个小小知县，资历很浅，和阎锡山并无关系。陈家父子叔侄，一向是在外省做官，没有参与过本省的任何事件。但陈钰在回省以后，由财政司长不久就任了民政长，山西方面都说他和袁世凯有亲戚关系。话虽不差，不过这只是表面原因，亲戚是有些方便，然而不是决定性的条件。这里，有必要把他得任民政长的真因揭露出来。

陈钰和袁世凯的关系

陈钰的父亲桂芬，是清朝的翰林，曾做过僧格林沁亲王的文案，和袁甲三（世凯伯父）是朋友。后来陈桂芬作了河南陈州府的知府，和袁家关系日益亲近。因此，两家结了秦晋之好，陈钰之女成了袁世凯的弟妻。成为世交而兼姻亲的关系。因此，陈钰官职虽小，但有事可以向袁直陈，也可以作书而报告。所谓方便，也只如此，并不是所有袁世凯的亲故都能做大官。陈钰被袁赏识，别有原因如后：

24 辛亥革命爆发后，直隶各地涌现出一些革命组织。滦州起义虽然被王怀庆镇压了，但牺牲的诸烈士如白雅雨、施从云、王金铭等，尚为世人所知。而张家口的革命组织，也有很多志士流血牺牲，但从来没人提到。最近才有王勉之《有关辛亥革命的自我回忆》和乔嗜冰《关北革命史略》两篇，把这一事件的经过披露出来。本篇主题，并不在此，但为了说明陈钰和袁的关系，不能不牵扯到这一件事。

关北革命组织的区域，东起居庸关，西抵绥远，张家口为总机关的所在地，王虎臣是这一总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在张家口活

动已久，和宣化镇总兵黄懋澄部下的军队有些联系，而主要力量，则是京张铁路的路警和工人。其目的是要在吴禄贞或张绍曾进兵畿辅的时候，起来响应；并由王勉之到滦州，告知张绍曾。

那时，张家口地面和行政，属于万全县。县署在张家口的堡里，陈钰常驻县署，为人机警，早对革命组织有所注意，并且让他的腿子们参加进去，伪装革命，从而探得了很多消息。在吴禄贞被刺以后，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张绍曾也不敢有所举动，张家口势成孤立，一掌难鸣。王虎臣有鉴于此，乃单身西行，准备和绥东晋北的革命势力联络起来，以图大举。这时，陈钰密报袁世凯，袁命他设法消灭，他就把这一组织为首的李宏恩、秦宗周、尹德威等杀害，王虎臣也被丰镇所同知暗算，其余的逃至北京。这一革命组织，被他完全破坏了！以此，深得袁世凯的赏识。

阎锡山对陈钰的拉拢

阎锡山自知是同盟会员，起义的主脑，很难逃过袁世凯的毒手，搞得不好，非但地位不保，甚至还要失掉自由，因而经常惴惴不安。周勃任民政长不久，知难而退。继任的谷如墉，知道阎的心思，对阎说明了陈钰和袁的亲戚关系，可以借他疏通。阎询知陈钰的胞侄子清，在河南任县知事职，因调他回省，改任山西首县（阳曲）知事，宠遇有加。由子清的中介，阎和陈钰也发生了关系。谷如墉因财政司长张瑞玘去职，也辞了民政长的职务，阎致电袁世凯暂以赵渊代谷，并保陈钰代张。袁世凯早有提拔陈之意，得电大喜。财政司是过渡，民政长是目的，阎意如此，袁意更如此。几个月后，陈就代赵作了山西民政长。

陈钰想来，关系在袁，启发在阎，从而对袁有特达之知，对阎有提携之感。因此，在不违背袁的意旨之下，尽量替阎多说好

话。经过陈的拉拢，阎对袁的关系日见好转。阎又升任陈子清做了烟酒印花税局局长，再讨好于陈钰。袁借陈以伺阎，阎借陈以媚袁，陈也善于完成双方的任务，从而他们之间，关系很好。陈钰卸任民政长后，袁任他为参议院参政。那时，参政的名额不多，地位很高，是袁用以安置清末的督抚、民国的都督、总长以及所谓海内名流的，像陈钰这种资历很浅的人，这样安置还是没有过的先例，这是袁对他在万全，在山西替他工作的酬佣。

（李泰棻）

四 民国罕见的“两面手法”、“阴阳人”

小 引

称阎锡山为两面派、骑墙派，始于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之后。年少在乡，已闻于师长前辈之口，同学间且戏呼脚踏两只船的人曰：“你这阎锡山。”弱冠求学武汉，迄后谋生各省，亦常闻之，其深印人心，遍传众口有如此者。顾于阎之如何施展两面手法？如何骑墙？只是人云亦云，实不详其经过。

1933年春入晋，知阎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扩大会议失败后，曾带其表侄梁化之及李冠洋等多人侨寓大连八个月，闲居多暇，辄谈民国往事，梁化之亦以素常闻之于阎者多有补充。余在太原四年，与此辈数人过从颇密，每有聚首，常谈论阎之过去经历，而于反袁及唐生智反蒋失败，尤数数道之，不厌其重复。闻之既久，颇得其详，然犹不敢遽成记录。1935年《论语》刊载一文，专叙阎骑墙事袁，并图阎站在娘子关头，右手高举五色旗，左手掩握黄龙旗之漫画以讽之。阅其文，颇嫌肤略，殊少事实根据。至于唐之反蒋，或因时间短促，不如袁事之影响深远，又不悉其个中底蕴，人辄忽而略之。其实唐之失败，阎亦极尽其

两面手法，与民国初年之对袁世凯者，殊无二致。

兹就两事所闻于山西及其他诸人尚能记忆者，纳而综之，笔之如次。

反 袁

袁世凯既窃据国家大位，犹以为民主总统不如君主立宪威势，蓄意改制，以称心愿。于是一面积极部署冀豫两省嫡系武力，巩固根本，并陆续借机削弱民党势力，简派亲信，带领北洋军队掌握川、湘、桂、粤等省军政；一面施用暗杀手段，刺死宋教仁，此为世人所共知之事实。

袁世凯于山西之初，阎锡山虽为民党督军兼省长，其实际权力，并不能控制全省局势。因晋省民党分为南北两派，初则彼此暗斗，继且南派设督军署于太原南之介休，以与阎锡山北派相对抗；而当辛亥革命时，山西仅有新旧军各一协，旧军为谢××所统领，较阎自领之新军力量为强。阎于民国一二年间，时虞谢军不利于己，朝夕优礼相加，每饭必俟谢至始下箸。阎虽毕业于日本士官，盖因晋中豪富仕阔之家，不愿以其子弟远送外国留学，始于新军士兵中选拔阎锡山保送留日者，论学则为赵戴文之蒙童生；论军则新不如旧，虽督军省长之尊，不为山西时流所敬重。以阎遇事待人低首谦谨，又奉示于某翰林之前（湖南人，任知府，有新思想，附和革命，辛亥山西反正，得任为民政司长）得以勉维人心，未即决裂。在此自保不遑之际，诚无力兼顾外事，故对袁世凯惟事委蛇，图借中央力量以制南派、兼慑谢军。袁在斯时，正全力集事于黄河以南各省，自亦乐于坐观虎斗，相与羁縻，且因阎之请求，问以法统地位虚为阎锡山声援，盖晋南派反阎兼反袁也。

后晋南派失败解体，谢军就范，阎锡山势力侵侵强固，不仅

紧握山西军政大权，且为民党在华北之有力人物矣。袁以晋冀密迩邻接，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乘南方安置就绪之后，移其视力措理山西，思欲得当去阎，免为帝制之累。适绥远不宁，有机可借，乃电阎云：“绥西上匪王英久未歼灭，仰该督军率部一旅前往清剿。”一面并派某姓大员驰赴石家庄，如阎违抗，即拟直捣太原，翦除后患。阎读电，征询赵戴文、贾景德意见，贾、赵深表愤慨，并言：“王英小股土匪，当难影响绥远局势，更无危及京津根本要区之理。区区小丑，绥远都统力量足以剿灭而有余，焉用督军之尊亲率军旅与数百乌合之众追剿于塞外荒烟漫草之间，岂非欺侮太甚，可置不理。”阎讳其言，直其理，惟沉默不示可否。熟思久之，觉袁有意督过，违将不利，决意隐忍，乃命以“即日率部清剿”复之。袁得回电，喜形于色，表示：“虽亲儿听命，亦不足过。”认阎懦弱，无所作为，可望利为己用，因急阻其行，并召回某姓大员，从此对阎锡山多方笼络，示无猜忌，昨之以民党见嫉者，今且以同党视之矣。阎亦处心积虑，更加小心，对袁遇事顺从，处处表示拥护，而对内则锐意图固政治地位，日事练兵，加强防守。

在筹安会宣告成立之初，民党党员梁觉（按：梁觉字竞魂，湖南安化蓝田人，现为涟源县治所在地。1948年去世。其文原载于北京《顺天日报》，后为《洪宪风云录》所收辑）首先发难反对改制，从此反对之声弥漫全国，尤以东南上海为最炽。袁恐发生变故，因急调冯国璋为江苏督军，以劲旅镇守南京；另派张勋率重兵驻防徐蚌，控制津浦南段及沪宁沿线，以增威慑东南力量。顾直求根本之地，经一再南调，大非昔比。于是阎之举足亦因时会而具轻重之势焉。袁以时势正不可料，决由东北调段芝贵部入关，填防保定；一面派人探询阎对改制之意见。阎见事在必行，因满口表示爱戴，故袁于帝制告成之先，宠之以爵位，用酬

拥护之功，以安阎心，阎亦唯唯表示感谢。洪宪改元之日，封阎锡山为子爵，阎亦公然受之，不以为辱，堂堂辛亥革命之山西首义元勋，一变而与袁世凯成为亲君臣子关系矣。世所谓“握黄龙旗，作晋绥王”者，其由来于此。

迄蔡锷起义云南，滇黔变色，护国军且分两路进兵四川、湖南讨袁，迫袁取消帝制。袁以好梦方酣，自恃武力强大，足以遏制护国军于川、湘境内。无何，桂粤宣告独立，川、湘继起，袁既伤亲信之叛已，深觉局势之日非，即退而筹划保持东西数省，以期徐图光复，乃再调直隶兵力分赴重地，并派段芝贵所部军驻山东，一以镇压柏文蔚之独立运动，兼以策应张勋、冯国璋之防守。至是原驻直隶命脉之区区北洋部队已被调派一空。逮死党陈××叛变独立于陕西，则袁世凯之嫡系武力已无可调之兵矣。颓局见成，计惟取消帝制，但不自引退，谢罪国人，仍希觊颜恋栈于总统高位，乃又指使冯国璋倡各省督军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期苟延残局。阎锡山出席会议之代表附和冯、张意见，主张袁世凯退居总统，继续秉持国钧，以示其始终拥护之意。

关中既告独立，袁以豫陕接壤，恐陈军东趋洛巩，危及河南安全，就调郑州平汉线兵力集驻洛阳以西，以资防堵。而所遗防务，实已无从抽拨，始有借用阎锡山部队驰赴郑州等地填防之举。袁之所以如此部署，不取道晋南渡河出师豫西者，诚恐阎、陈联成一片，更难收拾，不若调阎一部兵力于徐、洛夹持之间，减少阎锡山直接掌握之军队，以策万一耳。

计阎拥袁以来，各方多有责难之者，阎均置若罔闻，曾对人言：“当时晋中兵力，实非北洋之敌，稍一轻妄，极易招致于己不利之境地。”慑于袁之威服者数年于兹，内虽切齿、外貌惟恭、翼翼小心，未曾稍逞意气，其原因即在于此。

袁世凯漠视人民意志，昧于背向之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

以致引起举国上下之一致声讨。而阎独持首鼠两端：一面拱手奉袁；一面与蔡锷通声气，与民党诸人筹商时局，交换意见，托词“处境维艰，必将有以见白于天下后世”，其稳健油滑如此。

慨自关中继齐鲁独立，袁势日危，帝制取消，犹未能平息国人之怒，必欲驱袁下野而后已。阎见时机不可失，积极筹划兵备，决心促袁引退。

自阎锡山接到出师郑州电令，喜雪恨机会到手，立表服从。但言山西贫困，苦难筹措军资粮械，求袁接济。袁世凯信以为实，不虞有他，一口承诺，随即拨发军费 80 万元作军队开拔之用。阎即迅速集结兵力于娘子关，并派员领粮领械，有求必应。待所需齐备，即以兵力一部进驻石家庄，袁益信阎之诚意为不谬。

晋军抵石家庄后，从容检查军器，整齐队伍，军资实物缺乏者，继续请求拨付，藉以推延前进时日。而军物山积，缺车装载，又电京津速拨备用，以防袁调就近兵力应援北京。及至无法再拖，始令升火待发，延至深夜，命车北行，并电袁世凯云：“我军北驶，已抵保定。”袁接电，疑为阎锡山所卖，措手不及，恨悔已晚，病竟沉重不起。晋人称阎此电为袁世凯之催命符，盖纪实也。

唐生智反蒋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派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督师东征，讨伐蒋介石。经过所谓“庐山会议”、“国共分家”、“宁汉合作”，至是大革命宣告失败，唐生智随之垮台。年余，唐出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驻防河南信阳以北、许昌以南之漯河驻马店，对蒋介石心有不满。

1929年秋，汪精卫自法国归，倡改组国民党中央之议于广州。入冬，组合粤桂军陈铭枢、张发奎等成立军事组织，以与南京蒋介石相对抗，国民党改组派之正式出现即始于此。唐生智迷于汪在武汉时期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之政治见解较优于蒋介石之屠杀工农政策，随亦接受汪精卫之要求，拟联阎锡山一致反对蒋介石，企图推翻南京国民政府。

时，同县袁士权任唐生智总参议，日本士官毕业生，与阎为同期同学，凡同寝室，彼此情谊素洽。袁在上官同学中有智囊之称。唐以袁代表入晋商洽反蒋事，皆以为使当其选。

汪、唐原议计划：唐于河南就地发动反蒋军事，南趋武汉，顺江而下，直达南京；阎则出兵河北，占领平津，以串连平汉、粤汉两路，联成一气，互为声援策应，使蒋顾此失彼，穷于应付。

袁士权含命抵达太原，阎招待于山西大饭店。阎、袁相见，略叙阔别之情，袁即引及汪精卫广州反蒋事，唐以不耻于蒋之所为，已应汪之要求，准备就地起义，树帜反蒋。阎亦愤愤表示蒋杀人太多，专横无人，各方深致不满。袁于是进而表示汪唐希望阎出兵河北，占领平津，控制冀察，向津浦线南压，与唐采取一致行动，互为声援，以期策应广州，使汪之兵力得以越五岭而入湘赣，三路并进，决能应手。阎闻后，甚表赞成，连连称好，最后且拍案曰：“士权！就是这么干。”

袁因阎词如此明快简劲，全无半丝游移语意，深信不辱唐命，急将会谈经过电告。唐亦因以信之，准备行动更加积极。

从袁到太原面阎锡山之日起，旧交新识，络绎门庭，或相奉候起居，表示景仰，尊袁为军事前辈，捧袁为阎笃友；或相叙谈“党国”大事，纵论天下英豪，词意之间，多责蒋而贤汪唐。侍座陪游，极尽贵宾接待之礼，袁为之应接不暇，终袁在太原之日

未曾少闲。袁以阎忙于筹划军务，日无暇晷，而日来交接，莫不希望汪唐成功，自阎以下反蒋空气如此浓厚，以为阎之出兵，必能如约。

汪精卫以广东情况日危，唐又久无通电发出，乃电催迅速行动，及早牵制蒋介石军力。唐接电后，决先行动，并将汪电转袁，催阎早下决心。袁以事急要求会晤，阎深夜接谈，先致歉意，袁出唐电，阎阅后又以坚定语气表示：“土权！就是这么干。”于是袁继言唐之反蒋通电希望代发，阎立携袁手同入机要室守候拍发（阎之机要室及发报机在其办公室右耳房），并将电稿饬交通讯社记者发布新闻。

唐生智之反蒋通电既发，阎锡山亦积极行动，数日之后，其先头部队已抵达娘子关矣。阎并告袁：“一俟大部兵力集结，即向石家庄推进。”袁以任务圆满完成，即离太原来北京，伫候佳音。而世人亦因唐之通电发自太原，阎、唐之间必有密约，于是平津谣言纷起，人心疑惧，遑恐不安，以为将不免一战。

其实，当袁土权在太原之日，正何成浚代表蒋介石游说拉拢之时；袁土权座有高朋，迎送不遑之时，正阎、何密议，往复洽商之际。袁因为虚设之圈套，蒙蔽于纷纷扰扰之中而不自觉也。

唐生智之得任为第三路总指挥，本为蒋介石化敌为友之一种手段。自汪精卫倡议改组国民党中央于广州，蒋对汪、唐在武汉时期之政治关系即具戒心，恐唐一旦响应广州，扩大汪之声势，故于武汉、徐蚌之间，预置重兵，以防万一。闻唐积极部署队伍，决定举事，蒋即诉诸武力已为不可避免之事矣。时，冯玉祥住太原南之晋祠，其旧属仍唯冯命是依，然华北盟主地位已隐然操于阎锡山之手。蒋介石为断汪唐后应，决设法不惜任何代价稳定阎锡山，以免牵动大局，此何成浚所以入晋之原因。

何、阎本同期同学，交谊亦不恶，蒋介石固深知而特使之。

何抵太原迟于袁上权，招待于贾景德家。贾宅富丽豪华，为太原第一，花厅尤雅静，阎固曾借为招待贵宾之用者。今以处何，意在隔离何、袁，以便从中措置。

广东事变之前数月，阎邀冯玉祥入山西，住晋祠，其意本在一面表示对冯情谊之笃，一面又能作为要挟各方之工具，彼此互助依赖，或可望保存多年聚集之力量，拥护双方在政治活动上之资本与地位。今何成浚领命北来，则蒋介石之心情顾虑可以窥测其大半矣。于是阎锡山决心利用此一大好时机，作“高价而沽”之准备。无论在政治地盘上，经济财政上，拟肆意勒索一番，以为他日与蒋争一日之长短作好基础。因于何成浚相会之日，另装一副面孔，采取故持冷淡、不即不离态度，使何难于捉摸。何一提汪、唐此时反蒋于党国不利，阎则故言冯主团结以对之；何提华北安危为国家命脉所系，亟应早日筹之，阎又以中央惟事培植嫡系部队，置西北、华北各军于不顾，未能表示大公、一视同仁之意，安望不出事端以应之，随后并言：“今日之事，中央须要维持，地方亦应照顾，乃能各方有济，国事可成。”何闻后，知阎不满于蒋者多矣，顾蒋早有所患，今使北来者亦以是故。因乘便表示：“蒋过去所为，容有未当，然其体国之忠则昭然可见，今后决当改图，以期举国同心，上下一致，则外侮可攘，内乱可平。”阎慢应之曰：“若能改弦易张，则诸事必能得到解决，协调一致耳，既蒙跋涉而来，自当奉教，从长计议。”

何、阎经多日商谈，阎锡山心满意足，不顾汪、唐成败，决定倾向南京，尽力之所及设法巩固、维持蒋介石之统治权力。其最后议定条件，蒋介石以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政权交阎统治，拨款300万元作阎两路出兵费用。一路由潼关对岸之永济风陵渡出师，以断唐生智西联宋哲元之路，兼防唐部西走；一路出娘子关，由石家庄直趋郑州，向许昌以南压迫，以阻唐军北窜。此议

既定，阎即集结兵力于娘子关，身在太原之袁士权信阎如约，果今出兵，尚不审其与何成浚代蒋介石协议成功，决议一部接管平津，大部南下郑、许也。

后唐、蒋战事正紧之际，阎锡山曾亲至郑州督师，以尽其为蒋卖力之职责。故1930年扩大会议尚未揭幕之先，南京国民政府谭延闿等五院院长数次责难阎锡山，某电有云：“先生当年风陵渡之出师，郑州之命驾，又将何以自解”所指即此。

方伯雄先生告余：“何成浚当年回南京，曾将使晋经过面告蒋介石，蒋曰打完唐生智，再打阎锡山，此何所亲告者。民国十九年之中原大战，已伏机于数月前蒋、唐战事时也。”

余之北来养病在1930年初，寄寓戚家，距唐失败已月余。不久，唐之军医处长伍灼珊由津携眷租戚之西屋以居。伍亦同县人，朝夕相处，为言唐反蒋失败时事颇详。据云：“唐军事失利之速，蒋、阎军之猛进猛攻固其主因，而天时不利，大雪没膝，湖南部队不惯北方寒冷，致军机屡失，有此惨败，亦为人事之所不及料，而无法以抗拒之也。”又言：“唐一生作战，号称常胜将军，未有如其败退者，几较曹孟德之割须弃袍尤惨，部队固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即唐之警卫部队亦不审其去向，其乱可知。唐逃时惟政治部主任延国符与余及数名随身卫士而已。由漯河出发，皆换衣服，化装为商人，步行一天余，中途雇双轮大车代步，寒天雪地，朔风入骨，数日而至商丘，始改乘陇海车至徐州，转津浦到津。漯河至商丘一段，沿路艰困不可言状，实生平所未有。”

后与袁士权相识，会叙数次，所言在太原事，与余以后所闻者并详如前所云。袁于阎似无深恨，而犹对阎之困心横虑、应付时艰有雅能者；惟及以私害交，则仍不免于唏嘘感喟。老马不识途，智囊无妙计，终其身守一闲职，不复再理政治事也。

1935年冬，阎锡山召集李冠洋等干部某次定期讲话时，言及蒋介石背信弃义行为，犹有余恨。阎绝口不言得冀、察、平、津未废一枪一弹之力，更不提300万巨款得来只凭一言，坐收渔人之利。而当众云：“汪唐事起，我曾尽力拥护蒋之地位，出兵督师助其败唐，可谓仁至义尽，不料于唐事寢息之后，竟欲以怨报德加之于我。”余时年方壮，一无顾忌，因问曰：“既助兵败唐，何于数月之后又联汪合冯有扩大会议之举。”阎锡山从容答曰：“那是为了一口气。”

或言汪唐起事，事先殊少周密计划，又未早尽人事，先与各方相与磋商联络，预为安排。仓皇行事，终致失败。故世有呼“汪唐”为“荒唐”者，盖议其鲁莽而至灭裂耳。

(孟默闻)